

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 创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三峡区域调查数据的分析

石丹渐

[摘要] 基于2016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对三峡区域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以中青年、已婚者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与家庭小孩数量有关,返乡创业者学历以中等教育为主,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分布呈现倒“U”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则表现为近似“N”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受家乡地创业政策激励明显,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绿色生态农业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领域;汉族、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日工作时间较长;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2人就业,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男性收入的78.95%。计量研究表明,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是影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重要变量。加大返乡创业政策创新,分类诱导,有序实施区域创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协同变革,积极提升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推动更高质量的返乡创业。

[关键词] 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创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路径,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推动中西部地区

[收稿日期] 2017-05-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常态下教育与自我雇佣的经验研究”(17YJC880090);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开放基金课题“三峡流域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6-SDSG-02);湖北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青年农民工创业型自雇理论与实践研究”(16Q063)。

[作者简介] 石丹渐,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shidanxiedu@126.com

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农民市民化、区域城镇治理,以及促使县域经济由“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打工经济”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创业经济”转型,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有重大实践价值。因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工作,先后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8]130号)、《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关于实施开发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的通知》(农加法[2015]8号)、《“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国发[2017]10号)等政策文件助圆农民工返乡创业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据农业部测算,截止2015年底,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累计已超过450万人,约占农民工总数2%。返乡创业农民工累计注册个体工商户2505万个、农产品加工企业40多万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27万家、农业新型经营主体250万家^①。

新时期,随着国家“双创”战略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纵深推进,探究中西部典型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与创业质量,分析引致原因,提炼典型地区治理经验,对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诱导区域职业教育变革、推进地区精准扶贫、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如农村“空心化”衍生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问题)以及提升区域城镇化质量,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等有较大意义。鉴于此,本文以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2016年专项问卷调查数据,对典型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创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调适以及相关政策实施提供实证性支持。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起步较早。以Stark(1980)为代表所提出的新迁移理论早已用来分析劳动力回流现象,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又对移民回流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将劳动力回流主要原因归纳为城市就业受挫、城市务工技能提升和储蓄增多回流地收益更大、家乡生活成本低等。Dustman(1996)以及Lucas(2003)等后续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Stark的研究。

^① “农业部:45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占农民工总数2%”,新华网,2016-7-22。

在回流与创业关系探究中,多数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验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回流潮”背后将有一个回乡“创业潮”。正因如此,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从现有代表性研究看,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问题进行了探究:(1)劳动力回流创业的社会效应。如 McCann(2008)在对经济欠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回流创业考察中发现,回流创业对农村发展具有潜在积极影响,农村劳动力通过回流创业既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又可以激励社会价值发挥。(2)回流劳动力创业特点。如 Dustmann 等(2002)研究显示,在从德国回流的土耳其移民中,超过 50%的回流者在回流后四年内创办了小微企业。Gubert 等(2011)使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回流劳动力问卷数据发现,约 30%的回流者选择了创业,且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餐饮酒店业和建筑业等领域。Batisa 等(2014)基于莫桑比克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返乡移民的创业活动主要发生在零售行业和农业。(3)回流劳动力创业影响因素研究。如 Pieter de Wolf 等(2007)基于欧洲 6 国数据研究表明,农民返乡创业除需拥有生产技能,还需具备机会识别、风险控制等创业素质。North 和 Sallbone(2011)使用欧洲 5 个国家 10 个地区调研数据考察发现,回流移民的创业意识和个性化创业政策刺激是促进其创业的关键。Wahba 和 Zenou(2012)从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层面考察了出国务工经历对返乡劳动力创业概率影响,研究发现出国务工积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返乡创业的正效应超过了社会资本损失的负效应,因此出国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总体上有正向促进效应。

基于中国实情,国内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开展了较为丰富的探究,研究主题涉及返乡创业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等各个方面。其中:(1)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概念方面,黄晓勇等(2012)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定义为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务工过程中基于对内、外环境的机遇与挑战、自身优势与不足理性抉择是否回家乡所在的县城及乡镇所在地创办工商企业,或从事非原来意义的农业规模经营和开发性生产活动。(2)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基本特征方面,谢韶光(2011)的研究显示,返乡农民工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且主要经营形式为个体和私营,企业规模较小。张秀娥和孙中博(2014)重点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相关问题,发现返乡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明显推进作用。王岚和李佳(2017)的研究表明,当前返乡农民工创业以生存型创业为主,能人经济特征明显,机会型创业较少。(3)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金沙(2009)基于推理模型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进行了理论分析,他发现农民自身素质对其回流决策存在倒“U”效应。陈文超等(2014)发现,年龄、教育等因素对农民工创业行动影响并非线性,家庭

因素是决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性因素。邹芳芳和黄洁(2014)考察了不同来源创业资源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有资源(尤其是自有财务资源)对创业绩效影响要大于外部资源的影响。王立娜(2016)分析了“双创”战略以及互联网+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周宇飞等(2017)考察了新农村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周广肃等(2017)探究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将农村居民创业概率显著提高了1.8个百分点以上。(4)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建议研究方面,程业柄等(2014)认为,个性化的金融业务保障政策和财税政策是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必要保障。李敏(2015)提出,加大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返乡创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等有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郝浩强(2017)认为,开展农民工知识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的创业培训,促进农民工创业能力提升,是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

上述国内外代表性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较为广泛,研究主题基本上涵盖了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各个方面,如概念界定、作用机制、影响因素、政策建议等。(2)从研究方法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描述性统计分析,也有计量分析,如工具变量法和probit模型。(3)从研究对象看,既有对父辈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考察,又有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探究;既有对整个区域的返乡创业现象分析,又有对典型省份的专题探讨。这些成果对解释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有较强的说服力。然而,当前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针对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研究还相对少见,且现存研究设计不够细化,缺乏较为深入的量化分析,相对政策建议缺乏区域针对性和落地性。鉴于此,本文以中西部三峡区域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为考察对象,着重探究了中西部典型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及其质量问题。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三峡流域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课题组采用专家决策法,首先设计了专项问卷调查表,内容涉及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口学特征、创业行业、创业收入、创业享受政策与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满意度等基本信息。然后在湖北恩施巴东县进行了问卷试调查。最后借助当地政府办和就业局于2016年8月15—23日对三峡区域代表性地区(重庆黔江、贵州铜仁、湖南龙山县)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和专题座谈,共

发放问卷 800 份,由各地就业局派专门工作人员负责问卷调查工作,共计收回有效问卷 794 份。此外,课题组还从上述调研地的小康办、扶贫办等获得当地区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区域返乡农民工统计资料等一手数据,这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支撑。

需要说明的是,三峡区域地处武陵山脉、大巴山脉和巫山山脉之中,是以长江三峡和乌江、清江、沅江四江为纽带形成的、跨越鄂湘渝贵四省的社会空间。具体包括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其所辖 8 个县市、宜昌市及其所辖 13 个县市区、荆州市及其所辖 9 个县市区、荆门市所辖 8 个县、神农架林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 8 个县市区、张家界所辖 4 个县、怀化市所辖 13 个县市区、常德市所辖 9 个县市区、重庆市所辖 2 个地级区和副地级县 5 个、贵州省铜仁市及其所辖 10 个县市区。四周绕有武汉“8+1”城市、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贵阳城市群(还只在讨论和规划中),总人口 4600 多万人。有土家、苗、侗等 30 余个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自治州 2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10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 1400 余万,约占总人口 30%。该区域既是长江经济带上重要区域,又是国家中西部大开发和扶贫攻坚战略区,还是中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双流(进城和返乡)”活跃地区,自然风貌秀美、区位优势显著、地域交叉明显、人口结构多元、文化特色鲜明,是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典型区域。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农民工返乡创业描述性统计分析

	总体	汉族	少数民族
年龄(岁)	36.7	36.5	36.9
其中,男性	36.7	36.2	37.2
其中,女性	36.6	36.7	36.5
党员	6.60%	7.69%	5.48%
已婚	81.82%	83.08%	80.56%
男性创业者	46%	61%	32%
女性创业者	54%	39%	68%
创业者家庭没有小孩	11.34%	10.34%	12.33%
创业者家庭一个小孩	35.92%	36.21%	35.62%
创业者家庭两个小孩	44.34%	44.83%	43.84%
创业者家庭三个及以上小孩	8.4%	8.62%	8.22%
小学及以下	23.52%	19.40%	27.63%
初中	38.09%	43.28%	32.89%

续表

	总体	汉族	少数民族
高中	16.94%	19.40%	14.47%
中技/中专/职业高中	7.86%	10.45%	5.26%
大专及以上	13.59%	7.47%	19.73%
有某种职业技能或一技之长	59.5%	53.33%	65.67%
男性务工年限	9.0年	8.7年	9.3年
女性务工年限	7.3年	7.9年	6.6年
男性创业年限	3.4年	4.4年	2.3年
女性创业年限	3.3年	3.2年	3.3年
创业带动就业人数	2.49人	1.96人	3.02人
住宿和餐饮业	18.60%	17.20%	20.00%
批发和零售业	18.66%	18.75%	18.57%
绿色生态农业	16.45%	17.19%	15.7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2.03%	14.06%	10.00%
工作时间8小时及以下	30.75%	27.69%	33.80%
工作时间9—10小时	33.70%	30.77%	36.62%
工作时间11—12小时	23.90%	32.31%	15.49%
工作时间12小时以上	11.65%	9.23%	14.09%
选择会支持子女创业	90.15%	90.16%	90.14%

由表1不难看出,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以中青年、已婚者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创业选择与家庭小孩数量呈现非线性关系,家庭已有两个小孩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比例最高。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学历主要以中等教育程度为主,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分布呈现倒“U”型,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水平分布表现为近似“N”型;六成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拥有“一技之长”,说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理性抉择”而非盲目跟从。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平均务工(工作)年限为8年,汉族籍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年限高于女性,少数民族籍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年限则高于男性。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人数高于汉族籍对应水平,但总体上看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乘数效应偏低,平均带动2.49人就业。汉族、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日工作时间都较长,仅三成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每天工作八小时以内,汉族籍、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工作时间相对更久,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传统家庭分工等因素有关。

另外,调查数据还显示,八成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没有职业资格证书。在拥有“职业技能或一技之长”获得渠道上,汉族籍和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有较大的差异,前者主要是通过“工作中摸索(边学边干)”(32%)、“自己拜师学艺”(26%)获得,而后者则主要借助“自己拜师学艺”(22.95%)、“在学

校(技校、中专、职高、成人学校)”(19.67%)、“家乡地政府(如阳光工程等)组织的培训”(16.39%)等实现。“工作时间灵活可以兼顾家庭”(29.03%)和“为别人工作收入太低”(25.81%)是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两大主要原因,而“家乡政府有创业政策支持”(25%)和“工作时间灵活可以兼顾家庭”(20.59%)则是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两大主要原因。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创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有明显的示范效应(累计比例为48%)。其中,对男性、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累计占比分别为52%和54%。这与现有多数研究一样,表明父辈农民工返乡创业会影响其对子女的创业选择,且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父辈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创业代际传递效应都十分明显。其原因在于,经历了外出打工经历后,返乡创业农民工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事业,希望“子承父业”的心理表现明显。另外,由于血缘、亲情等纽带作用,使得父辈创业经历、创业资源、创业心得等也更易在家族内顺畅传递影响子女。在创业政策与激励方面,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受家乡地创业政策激励明显,农民工返乡前务工行业与返乡后创业领域有明显变化,工作行业从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整体上有助于推动家乡所在地县域经济结构升级转型。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评价方法及其表现

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既是深度研判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趋势的需要,也对新时期区域返乡创业政策调整、新型城镇化战略创新施策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高低也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意愿)以及创业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因此,创业质量近年来成为学界探究农民工创业问题的重要视角。从现有国内外创业质量相关研究成果看,学者们评价创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主要方法有三种,即单一指标法、多维度指标法和综合指数法三种。单一指标法用单一指标来测度创业质量,单一指标既可以为客观指标,如创业收入,又可以为主观指标,如创业满意度。代表性研究有 Jones 和 Sloane(2007)、Boccuzzo 和 Gianecchini(2015)、苏丽锋和陈建伟(2015)等。多维度指标法,是指通过构建若干个不同层级的维度、指标体系来考察某一地区或国家或群体的就业创业质量。代表性研究有欧洲基金会的四维度就业质量评价法,孟大虎等(2012)、Okay-Somerville 等(2013)、梁英(2015)也使用了此方法研究就业创业质量。综合指数法则是用等权重法、算术平均加权法、主成分法等合成就业创业质量指数来衡量就业创业质量状况。代表性研究有 Charlesworth 等(2014)、苏丽锋(2013)、赖德胜等

(2011)。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主要采用了第一种创业质量的评价方法。但与采用相同方法的其他同类研究相比,本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通过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并列使用了主、客观指标法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进行了探究。

在创业收入方面,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收入呈现明显性别和民族特征。具体表现为,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收入的 79.0%,其中,汉族籍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汉族籍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收入的 65.4%,少数民族籍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少数民族籍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收入的 92.5%。汉族籍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高于少数民族籍男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汉族籍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则低于少数民族籍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性别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少数民族籍对应水平。具体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民族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创业收入的比较

	总体	汉族	少数民族
男性创业者月收入(元)	6857	7479	6234
女性创业者月收入(元)	5329	4890	5769
女性收入占比男性收入的比例	79.0%	65.4%	92.5%

在返乡创业满意度方面,调查数据表明,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满意度整体上较高,其中,“满意”为 17.65%，“非常满意”为 39.89%。返乡创业满意状况呈现显著的性别、民族和婚姻特征。具体来看,男性、少数民族籍、已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对当前创业状况满意度状况要明显高于女性、汉族、未婚或其他婚姻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详见表 3。

表 3 不同特征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创业满意程度(单位:%)

满意程度	总体	男性	女性	汉族	少数民族	已婚	未婚
非常满意	17.65	10.29	25.00	10.98	24.32	21.55	13.75
满意	39.89	48.53	31.25	40.59	39.19	36.21	43.56
一般	35.77	35.29	36.25	43.16	28.38	34.48	37.06
不太满意	5.22	2.94	7.50	3.68	6.76	6.03	4.41
很不满意	1.47	2.94	0.00	1.59	1.35	1.72	1.22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此外,从职业技能水平看,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越高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其返乡创业满意度也会越高。“没有”、“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

“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及以上”的样本选择“非常满意”比例依次为 8.58%、10.77%和 23.33%、选择“满意”占比依次为 27.17%、42.5%和 45%。创业满意度随着职业技能水平提升而增加的原因在于,拥有专业资格证书越高,返乡创业农民工越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业领域“单干”,越能充分施展自己技能或知识,将有利于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认同感,因此越满意。从流出地政府支持返乡创业类型看,获得“技术支持”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最为满意(“非常满意”占比 21.05%),其次是“资金支持”(19.59%),然后是“人力支持”(16.67%),这一特点在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身上体现更为明显。可见,技术是当前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最为珍贵“补给品”,在返乡创业过程中,解决“缺技术”问题比解决“缺钱”和“缺人”问题更为关键。

五、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实证结果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看,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明显的民族、性别、年龄、行业、家庭、学历等特点。同时,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存在较为突出问题,比如,返乡创业以生存型创业为主,机会型创业偏少,返乡创业日时间较长、返乡创业行业分布缺乏多元性,返乡创业者学历程度不高,拥有高职业技能返乡创业者相对不多等,这表明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整体上偏低。众多相关理论与实践表明,引致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不高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受返乡农民工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状况、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又与返乡创业地的产业结构、创业政策、风俗文化、商业氛围等有关。为更好地探究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问题,下文将基于返乡创业质量评价方法相关思想构建相应计量模型进行经验分析。

采用客观指标法测度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计量模型如下:

$$\ln Y = \beta_0 + \beta X + \mu \quad (1)$$

上式中 $\ln Y$ 为因变量,表示返乡创业农民工月收入的自然对数, X 为自变量向量集,具体包括返乡创业农民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创业特征变量等, β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用来判断其对创业质量的影响, β_0 、 μ 分别为模型的截距项和随机干扰项。

采用主观指标法测度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时,由于因变量创业满意度取值具有序列等级特点,因此采用了有序 Probit 计量模型。

模型变量选取与赋值见表 4。

表 4 变量选取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赋值
人口学特征	Male	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
	Minor	民族状况	少数民族为 1，汉族为 0
	Marry	婚姻状况	已婚为 1，否则为 0
	Child	子女情况	当前家庭小孩数量
人力资本	Edu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Exp	工作经历	实际工作年限
	Expsq	工作经历平方	实际工作年限平方
	CYNX	创业经历	创业年限
社会资本	QPCY	亲朋创业	亲戚或家人或朋友创业为 1，否则为 0
创业特征	Size	创业规模	除家庭帮工外，实际吸纳全职就业人数
	ZYJN	职业技能	有职业资格证书为 1，否则为 0
	Indus1	住宿和餐饮业	住宿和餐饮业为 1，否则为 0
	Indus2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和零售业为 1，否则为 0
	Indus3	居民服务业	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为 1，否则为 0
	Indus4	绿色生态农业	绿色生态农业为 1，否则为 0
	CYZC	创业政策	对创业政策一点也不知道为 1，知道一点为 2，比较清楚为 3，很清楚为 4

采用客观指标法测度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的稳健性 OLS 法计量结果显示：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变量显著地正向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状况，而家庭小孩数量则对创业质量提升有负向作用(详见表 5 第三列)。

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质量总体上比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创业质量高 29.0%($P<10\%$)。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创业就业促进一直实施着更加积极的政策扶持，这些激励政策“拉力效应”日益显现。国家在民族地区对返乡创业给予的场地、税收、审批、管理等全面支持，使得少数民族籍返乡农民工更易享受到这些创业政策红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文化异质、习俗习惯不同、落户安家难等现实问题产生的“推力效应”，也使得少数民族籍农民工更加愿意主动返乡创业谋发展。因此，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质量更高。

已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比其他婚姻状况者的创业质量高 27.0%($P<10\%$)。原因在于：返乡创业既需要物质资源又离不开精神资本，相比那些其他婚姻状况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已婚返乡创造者更易在当前差序格局社会

网络中联络到更多的创业物质资源,这提升了返乡创业概率。已婚返乡农民工也更易从家庭获得创业情感支持或创业压力慰藉,这为选择返乡创业提供了精神动力。另外,就地就近创业谋发展还能更好照顾家庭,享受家人常伴的幸福感,创业生活质量自然较高。

外出务工工作经历和创业年限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作经历每增加一年,创业质量提升 2.8% ($P < 10\%$),创业年限每增加一年,创业质量提升 9.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知,工作经历或创业年限的不断增加,会不断提升其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初始创业资金的积累,这为其选择返乡创业奠定了的重要基础。而创业年限越久,除对专业技能水平有所促进之外,还有助于促进对创业市场、创业风险、创业管理等方面素养上午发展,而这些都是影响创业质量的重要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工作经历对返乡创业质量影响效应并非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 U 曲线态势。因为随着农民工外出务工工作经历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年龄后,出于精力、稳定和净收益等考虑,会使其继续留任现有岗位、选择工资性就业(wage-employment)或退出劳动力市场。

家人或亲朋好友创业,不仅对返乡农民工选择创业提供了可能的资金扶持,还会在创业技能、经验、沟通、市场方面给返乡农民工提供直接支持或间接启示,这最终都会使其成功创业有较大的促进。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相比没有亲朋好友创业者,那些有家人或亲朋好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更高(21.4%, $P < 10\%$)。

从创业行业和创业规模看,在其他条件相同条件下,选择进入“绿色生态农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质量比其他行业创业者高 53.50% ($P < 5\%$)。这与该区域独特的区位优势(武陵民族地区)和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战略部署(长江经济带、三峡生态合作区、中西部大开发和扶贫攻坚战略区)有关。近年来,该区域依托精准扶贫项目和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布局着重开发乡村、乡土、乡韵潜在价值,积极发展农林产品加工、农产品电商、休闲农业、林下经济、乡村旅游特色优势产业,为返乡农民工进入绿色生态农业领域创业提供了重要创业机会。围绕生态行业、依托乡风乡情,选择创业往往会得到收入和生活满意双提升。因此该行业领域的创业质量较高。创业规模越大,其越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创业行为越易溢价,因此创业净收益和效用也会越高,创业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从创业政策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哪些不了解创业政策者,那些对创业政策越清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其创业质量越高(11.8%, $P < 10\%$)。原因不难理解,由有限理性政策模型可知,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行为当事人对公共政策越了解,作为理性人的行为人越有可能借助政策配置资源

谋求合法私人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大量理论和实践也表明,创业政策是影响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的重要变量,创业当事人通过对创业政策的理解和使用,进而从政策实施中获得较大的创业收益(这其实也是国家推行公共创业政策的根本初衷,即让那些想创业敢创业的更好创业),无疑会抬升其创业收入和满意度,因此创业质量会越高。

使用主观指标法测度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稳健性计量结果见表5第四、五列。不难发现,除性别变量外,其他影响创业质量的变量与采用客观指标法测度结果类同。有序概率模型计量结果也显示,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也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质量重要变量。这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第一个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主观指标法模型各变量的具体影响结果、边际效应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等不再赘述。

表5 基于客观指标法、主观指标法的计量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客观指标法	主观指标法	
		OLS 模型结果	Oprobit 模型结果	
		稳健性系数	稳健性系数	边际效应值
人口学特征	Male	0.052	0.258*	0.010
	Minor	0.290*	0.257*	0.004
	Marry	0.270*	0.214*	0.068
	Child	-0.210	-0.359	-0.011
	Edu	0.052	0.098	0.005
人力资本	Exp	0.028*	0.026*	0.001
	Expsq	-0.002	-0.003	-0.000
	CYNX	0.094*	0.125*	0.004
社会资本	QPCY	0.214*	0.110*	0.004
创业特征	Size	0.072***	0.125**	0.001
	ZYJN	0.124*	0.228*	0.005
	Indus2	0.377	0.515	0.010
	Indus3	0.002	0.018	0.019
	Indus4	0.535**	0.949***	0.032
	CYZC	0.118*	0.253**	0.010
	Obs.	794	794	794

注:(1)***表示 $p<1\%$; **表示 $p<5\%$; *表示 $p<10\%$ 。

(2)O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值以“不满意”为基准组。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2016 年专项问卷数据,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以中青年、已婚者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与家庭小孩数量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学历程度以中等教育为主,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分布呈现倒“U”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则表现为近似“N”型;六成返乡创业者拥有“一技之长”,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并非盲目跟风而是理性选择;“干中学”和“拜师学艺”是汉族农民工创业技能获得主要渠道,少数民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则明显受到家乡地创业政策激励;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绿色生态农业是主要返乡创业领域;汉族、少数民族返乡创业者日工作时间较长;农民工返乡创业平均带动 2.49 人就业。此外,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新时期,更好的推动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一)加大返乡创业政策创新,增强返乡创业个性化支持

新形势下,为推动农民工返乡高质量创业,区域和地方政府仅仅简单套用、机械执行国家返乡创业政策文本远远不够,而应充分学习、有序接应、二次创新、分类诱导、因地制宜。针对中西部民族地区区情,地方政府应主动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教育政策、返乡创业金融政策、返乡创业培训政策、返乡创业服务政策等方面积极创新,尽力使区域返乡创业政策个性化。具体而言:

1. 在返乡创业教育政策方面。区域政府应加强各部门合作长效机制探索,建议深度整合人社、农业、教育等部门以及区域内涉农院校、职业学校等资源开展符合农民工认知的创业教育培训;加强区域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对条件适宜的返乡农民工,鼓励其到区域内中职中专或高职高专免试就读,并全部纳入免学费范围;同时选择有代表性的返乡创业企业作为区域高校就业见习、青年教师、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实习实训基地。

2. 在返乡创业金融政策方面。针对当前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对资金的共性迫切需求,除稳步推行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基金、税费减免、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外,区域政府还应大力支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资金互助社等商业组织对低端市场的微型客户的直接和延伸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供给,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资金“清障搭台”。

3. 在创业技能培训方面。应依托中西部民族地区承接的转移产业、国家精准扶贫项目以及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和乡土文化等,加大对返乡创业培训经费和补贴支持力度,分类施策创业职业技能型创业培训,鼓励大学者与土专家齐上阵,为返乡创业“赋能”、“增智”。当前湖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七大行动计划”、湖南“星创天地”、重庆“筑巢引凤”、贵州“万千百工程”和“星光培训工程”项目等十分有益,值得深度推广。

4. 在返乡创业服务政策方面。依托“互联网+返乡创业”战略,大力建设区域基层返乡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立在外人才数据库,有效引导,精准扶持,建设区域创业项目备选库,及时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充分利用“云、端、网”线上线下时时推介、定期举办人才交流会,帮助返乡创业企业纳贤引士。另外,善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吸引更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专业类返乡创业服务供给,如维权、咨询、技能培训等。

(二)重视提智增能,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综合素养

众多理论和实践表明,劳动者综合能力状况是影响其高质量就业创业的关键变量。对于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业创”和是否“创的好”,这都与返乡农民工的综合能力紧密相关。而综合能力受到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的影响。在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基础上,农民工自身应积极转变观念、重视以在职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形式的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商业管理、政策领悟与运用能力积极学习,更好释放自我返乡创业过程中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一方面,这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精准的返乡创业培训政策帮助创造创业机遇。另一方面,更需要万千农民工返乡创者主动转变行为模式,习得新知或新技。如掌握农产品电子商务、休闲农业、创意农业、森林康养、乡村旅游等先进经营之道。只有在自我认知体系中把返乡创业视为“打拼出彩人生的金钥匙”而非“逃离繁忙都市枷锁的出路”时,才能更好推动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由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渐进蜕变。

[参考文献]

- 陈文超等,201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程业柄,201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因、障碍及对策研究》,《安徽科技学院学报》第1期。
- 郝浩强,2017:《关于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榆林学院学报》第1期。
- 黄晓勇等,2012:《农民工回乡创业:定义与边界、发生机制及概念模型》,《经济体制改革》第4期。
- 金沙,2009:《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分析》,《统计与决策》第9期。

- 赖德胜、石丹浙, 2013:《我国就业质量状况研究: 基于问卷数据的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第 5 期。
- 赖德胜等, 2011:《2011 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敏, 2015:《大众创业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探究》,《中州学刊》第 10 期。
- 梁英, 2015:《城乡背景与在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 4 城市的问卷调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刘溢海、来晓东, 2016:《新时期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综述》,《农业经济与科技》第 19 期。
- 孟大虎、苏丽锋、李璐, 2012:《人为资本与大学生的就业实现和就业质量——基于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第 3 期。
- 苏丽锋, 2013:《我国转型期各地就业质量的测算与决定机制研究》,《经济科学》第 4 期。
- 苏丽锋、陈建伟, 2015:《我国新时期个人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教育研究》第 4 期。
- 谭志松, 2016:《一个值得深入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空间——三峡流域社会》,《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科版)》第 2 期。
- 王岚、李佳, 2017:《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农场经济管理》第 1 期。
- 王立娜, 2016:《“互联网+”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契机、挑战与对策》,《理论导刊》第 6 期。
- 谢韶光, 2011:《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探析》,《经济纵横》第 3 期。
- 张秀娥、孙中博, 2014:《返乡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作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周广肃等, 2017:《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经济学(季刊)》第 2 期。
- 周宇飞等, 2017:《新农村文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邹芳芳、黄洁, 2014:《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第 4 期。
- Batista, C., T. McIndoe-Calder and P. Vicente, 2014, “Return Migration, Self-selec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Mozambique”, NOVAF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1401.
- Boccuzzo, G. and M. Gianecchini, 2015, “Measuring Young Graduates Job Quality through a Composite Indica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453—478.
- Charlesworth, S. and J. Welsh, 2014, “Measuring Poor Job Quality amongst Employees: the Vice WAL Job Quality Index”, *Labour and Industry*, 24(2): 103—123.
- Dustmann, C. and O. Kirchkamp, 2002, “The Optimal Migration Duration and Activity Choice After re-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7(2): 351—372.
- Dustmann, C., B. Samuel and F. Riccardo, 1996, “Return Migration: The European

- Experience”, *Economic Policy*, 22(11): 213—250.
- Gubert, F. and C. J. Nordman, 2011, “Return Migration and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Maghreb”, in Plaza, S and D. Ratha, eds., *Diaspora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103—126.
- Jones, R. J. and P. Sloane, 2007, “Low Pay, Higher Pa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Wales”,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2): 197—214.
- McCann, P. and A. Faggian, 2007, “Human Capital Flows and Regional Knowledge Assets: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Approach”, *Oxford Economic Paper*, 58(3): 475—500.
- Okay-Somerville, B. and D. Scholaries, 2013, “Shades of Grey: Understanding Job Quality in Emerging Graduate Occupations”, *Human Relations*, 66(4): 555—585.
- Pieter de Wolf, G. Mcelwee and H. Schoorlemmer, 2007, “The European Farm Entrepreneu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6(4): 692—679.
- Robert E. and B. Lucas, 2003,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Movers and Stayers: Assimilation, Impacts, Links and Proximity”,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4—7, June.
- Stark, O. and J. T. Edward,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408): 1163—1178.
- Stark, O., 2003, “Tales of Migration without Wage Differentials: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ty Contexts”,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4—7, June.
- Wahba, J. and Y. Zenou, 2012,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2(5): 890—903.

Employment Quality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Ethnic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Based on Three Gorges Region in China

SHI Dan-xi

(Law and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in 2016, this article researched the entrepreneurial

situation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in ethnic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It's found that the ethnic group, marital status, work experienc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relatives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scale, entrepreneurial skills, entrepreneurial industry, entrepreneurial policy ar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for returned-migrant-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Implem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 and personalized returned entrepreneurial policy and increasing the reform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ing could help more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achieve higher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fficiently in ethnic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Key words: ethnic areas; returned migrant;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责任编辑: 刘泽云 责任校对: 刘泽云 孙志军)

(上接 97 页)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China'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ZHOU Ming-hai¹, XU YANG Yun-tao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Tufts University)

Abstract: By using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econometric model, this study treat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examines its transmission effect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income elasticity is positive, meaning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will lower dow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nd increase inequality.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hinder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mainly through the female children. We argue that families with high income and high social class have better abilities to capture the benefits from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责任编辑: 杨 娟 责任校对: 杨 娟 胡咏梅)